

## 汉徐闻城城址

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建置合浦等九郡。《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辖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崖等五县。西汉时徐闻县是个大县，其辖境为整个雷州半岛。当时的徐闻县港口，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最近出海口。1973年以来，省、市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勘查这一遗址。经过反复调查，湛江市和徐闻县的考古工作者于1988年12月在今徐闻县南端的原五里乡（今南山镇）二桥村后坡发现了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在雷州半岛建置的徐闻县治所遗址。

二桥村后坡是一处南临琼州海峡的大台地，海拔25-3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其东有长年不枯的淡水小河那涧溪，源起石门岭南麓，全长9公里，出海处就是那黄海港；其西为磨练海港；其东为东岗洋；其南临海，前面海中峙起三岛（俗称三墩）；其北连那涧村，有古道通往内陆。形势险要，交通方便。治所遗址位于三堆仔台地，坐北向南，不筑城垣，只堆土垒石为基，营构山寨，以为镇守。主城寨基犹存，残宽3.5-6.8米，残高0.6-1.25米，实测南北长95米，东西宽85米，周长360米，呈方形，面积8075平方米。主城寨南面，紧连第二台地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现属二桥村。第三台地即为二桥南湾东西两侧滨海地带，属沉积层，主要发现唐宋以后的文化层，发现唐莲花瓣纹大理石井和宋、明、清代瓷器，间有汉代遗存。

二桥村西高台崖壁，临港头湾，落差约10余米，全长500多米。这里地势自西向东倾斜，20多万平方米地段表层散落着各种汉陶、汉瓦碎片，在崖壁上发现了泥、砂、石合筑的夯土层，这种古老的人工痕迹，以及近旁就是汉代生活遗址的逻辑关联，正好和《徐闻县志》“徐闻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讨网村，前临大海，峙三墩”相吻合。地理学家，中山大学地理地质学院博士生导师司徒尚纪教授在考察中认为，从高台的地理结构来看，有可能是古城堡的遗址。这个突兀的高台利于直视海面，具有明显的军事作用。在当时贸易交流的情况下，必须有这样防海盗、防对面海南岛民族部落入侵的军事驻所。



南山镇二桥南湾村后高台遗迹

广东省考古所原副所长邱立诚教授认为，根据人工垒砖和夯土痕迹、简单的相关史料作出判断为时尚早，还需进行探方发掘，找出房子的遗迹分布情况，确定房子的功能，才能做出进一步判断。

在现场考察中，专家们认为城堡存在的可能性较大。如果一旦确证，这将是广东第二座汉代城堡，同时由于它建筑于“海上丝路最早出海港”，其价值不言而喻。

地方志中载“徐闻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现今的二桥南湾，为古讨网村。徐闻临海的三墩地形及大量出土的汉代陶罐、筒瓦、板瓦、瓦当等印证了地方志中的“讨网村”面临大海，“峙三墩”的情况。



三墩港、海安港地理位置图（岑元冯图）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示意图（锤绍益手绘）

在仕尾村北仕尾岭上，考古发现了一个呈八角形，径2米，深40厘米的巨型石雕，有专家考为“航标灯座”。灯座八角有八卦饰纹，内被火灼成黑色，因年代久远而有多处龟裂，汉唐时期曾在此点燃“烽火”，示意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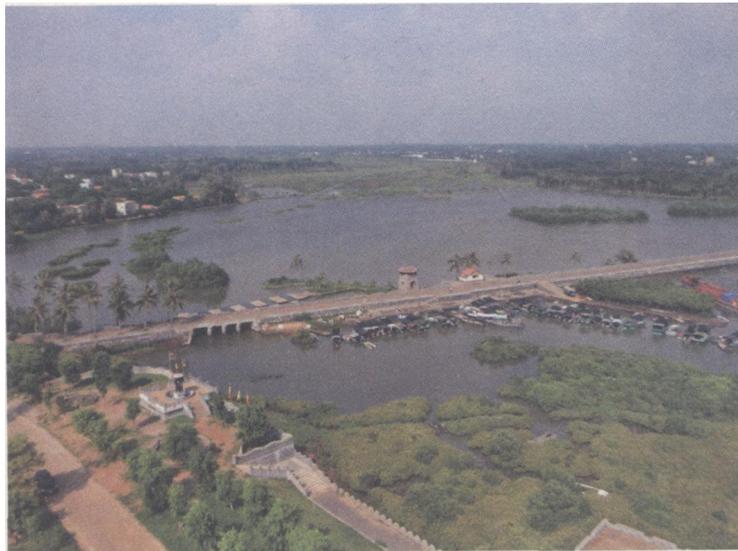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甘子钧教授在考察“三墩”时，从海洋学的角度分析道：徐闻处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大气环流使得这里秋末春初盛行东北季风，顺水可日行数十里，适合当时的双桨无帆人力船出海到东南亚诸国；而春末至夏秋，西南季风大盛，又适宜海外船舶来华。由此认为，徐闻当是汉代徐闻所在更无疑义。

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

## 汉徐闻城、徐闻港鸟瞰图



徐 闻（汉徐闻城遗址所在）



徐闻港  
（汉徐闻港遗址所在）



二桥村航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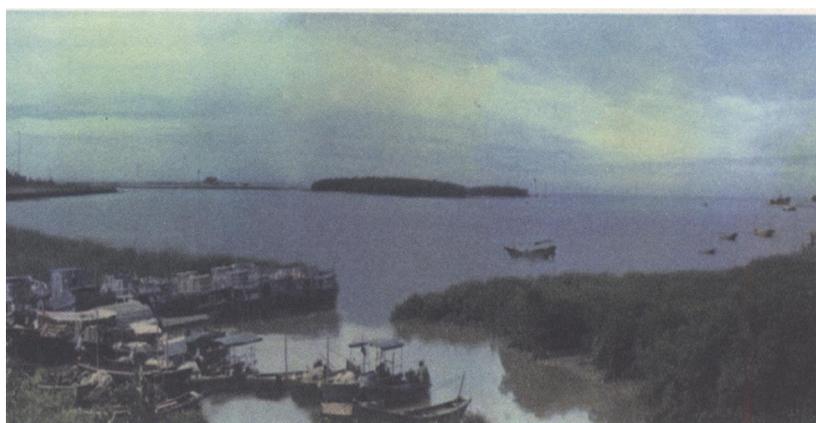
只供阅读 请勿厚权



火车轮渡码头



仕尾岭八角航标灯座



三墩港口外景图

位于徐闻县西南的原五里乡（今南山镇）二桥、南湾、仕尾村，是一处伸向琼州海峡的半岛形岬角。前临大海峙三墩。南北走向的平台地貌，海拔10米，临海边缘地势险兀，大部分从海滩突兀而起。二桥、南湾村后有那涧溪，源自北草岭之牛母泉，竹芭溪过讨南东的鹤嘴田、米糠田、东堰塘、堰塘峡、马屯田、双沟仔、那干村东、仙人座、南山下、东岗岭前出海，常年流量0.3海里/时—0.4海里/时；另有一条溪流自毛练、港头东、二桥西出海。从南山过二桥，古有一道桥，另从港头到二桥，亦有一道桥，均为宋置，故该地称二桥。二桥西港称港头港，又称后港，二桥东港，原至东岗洋，老人称当时40吨的安南船可驶入东岗洋前。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富户开始自南山到仕尾一段筑堤造坝。1958年，加修南山围堤，大量挖掘仕尾岭土石，把仕尾岭古代文化层全部破坏。古时交通主要沿二桥南湾村、仕尾村西海滩通行，在仕尾村西峭崖下海滩仍存古牛车道遗迹和古井。

二桥、南湾地势西高东低，出现三个梯次平台。第一平台，自二桥村后大园入村口至南湾村西一段，长近1000米，落差较大，临海峭壁高达十余米，可明显看见各种文化层，有专家认为这是城堡痕迹。第一平台现仍为耕地，地表散落着大量汉代方格印纹陶片，绳纹板瓦碎片。第二平台，自二桥村中牛车路为界至关帝庙后。这个平台地带，为村民集居地带，地表散落大量的汉代板瓦、筒瓦、陶片。村民起屋，挖到成型陶器以及板瓦、筒瓦、印纹砖，甚至铜器。汉“臣固私印”就是南湾村民谢贵丰在挖墙基时发现的。第三台地，即二桥小学至关帝庙一段。其地仍出现大量汉代板瓦、筒瓦碎片。

1990年，《广东文博》刊载邱立诚、尚杰《徐闻汉唐生活遗址考察记》。1991年，《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详细介绍汉代徐闻港旧址以及出土的“万岁”瓦当，粗细绳纹乳点纹板瓦，筒瓦，印纹砖，方格纹加圆形、菱形戳印陶罐，弦纹陶罐等考古发现。

1993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部门及湛江市、茂名市、高州市、徐闻、遂溪、廉江、海康、吴川各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在二桥、南湾、仕尾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大型探方发掘，首先，在仕尾岭进行探沟发掘，未果。接着在第二台地进行定位探方发掘，在第三台地进行小型探方发掘。第二台地探方区在南湾村潘家连老师屋前院子菜园进行，开掘5×5米探方14个，面积350平方米。地层堆积为四层，二、三、四均为汉代文化层。发现遗迹有墓葬、灰坑、房屋、遗址、水井、烧土面及柱洞等。第三台地小探方也发现汉代瓦片。探方中清理的古墓葬出土水波纹折腹钵1件，陶釜阔沿和陶碗、陶网坠。灰坑20个，出土大量绳纹瓦片、瓦当碎片素面带釉陶片和小方格印纹陶片、弦纹、



1993年11月二桥村考古发掘现场

水波纹陶片、兽纹铺首。房屋遗址4个，出土大量瓦片面和火烧土。水井1个，出土大量绳纹瓦片、釜罐、杯、砖、钵碎片，铜镞1件。

二桥、南湾发掘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釜30件（大部已残）、罐68件、瓮5件、盆3件、钵2件、碗2件、器盖1件、器座1件、陶棒1件、陶纺轮4件、陶网坠6件。建筑材料以绳纹的瓦和筒瓦为主有1万多件，还有部分的汉砖、瓦当和石制的小建筑物件。板瓦的胎质以灰、橙色及橙红色为主，厚1-2厘米等。瓦面饰粗绳纹、细绳纹和弦纹，瓦内饰乳钉纹、布纹、菱格纹、卷草纹等。

在该遗址还采集到“万岁”瓦当，龟钮铜印“臣固私印”，“十五”陶文板瓦，“白”字陶文筒瓦、“X”“五”字印文砖。



太阳芒纹陶钵（战国）

筒瓦



绳纹陶板瓦

乳钉纹板瓦



“万岁”瓦当

“万岁”瓦当拓本

卷云箭镞纹瓦当

卷云箭镞纹瓦当拓本

徐闻县汉代遗址是广东所发现的十个汉代建筑遗址之一，又是四个出瓦当的遗址之一，也是两个出“万岁”瓦当遗址之一。徐闻共发现四种，时代属西汉的是灰胎质的卷云箭镞纹瓦当，与五华雄狮山汉代遗址出土的形制一致，“万岁”瓦当，灵芝纹瓦当、吉羊纹瓦当。何正璜先生认为“瓦当为建筑物上起实作用又具美化效果的附着物。根据实物辨识，附着精美纹饰的瓦当多为秦汉两代遗物”。“由于秦汉是使用瓦当的鼎盛时期，因此‘秦汉瓦当’成了专门名词和专业性类的考古材料”。

通过瓦当文字，不但可判断建筑物的时代，还可确定历史城邑、宫殿的名称和位置。如广州市“万岁”瓦当的出土，确认了南越王宫署遗址的所在。西汉初年，使用“万岁”瓦当只能是皇家贵族，非同一般。那么，徐闻“万岁”瓦当的出土，同样可以确认汉徐闻城址的方位以及使用“万岁”瓦当的“黄门译使，左右侯官”的品位。王俞春《中国历代

官署官名辞典》记：“黄门，官署名。汉代置，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黄门侍郎。官名，沿秦置黄门侍郎，其职担任皇帝传达诏令，处理宫中杂事。由宦官担任，可出入官禁。”“译长，官名，汉时黄门所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称为译长。汉代在西域各国属国中也设有译长，掌传译等等。”所谓侯官，《礼记·王制》记：“五等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邶风·旄丘序》孔颖达疏“侯为州牧也”。侯为五等爵之第二等，此制沿用至清代。由此可见，汉朝廷黄门曾在徐闻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建置行官之类的官署，它的级别相当州郡之治。

二桥、南湾汉代遗址出土一枚龟钮铜印“臣固私印”，引起文物考古专家的关注。印为龟钮铜质鎏金印，长2.5厘米，宽2厘米，高1.3厘米。其印与广西贵阳县北郊汉墓出土的“苏伉私印”不同，苏印为玉印，仅1.5×1.5厘米见方。印文内容亦不同，“臣固私印”自称臣，而“苏伉私印”纯粹为私印。而海南出土的“朱庐执到”印，其印又为银质，纯属官印，所以徐闻汉印与他地汉印各有千秋。而且徐闻海安广安新莽时墓葬还出土一枚“张己印”，此印精小，铜质桥钮，仅1厘米见方，应是罕见之汉印。“臣固私印”的发现，进一步充实了徐闻汉代文物藏品并且提高了徐闻汉代文物的价值与品位。

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史树青、叶其峰、朱家潘等先生鉴证，该印为西汉早期。朱家潘先生认为该印印主身份应是：“郡太守属下，主簿从事”，查《汉官仪》和《汉书历官公卿表》，说明铜官印是秩在二百石至千石官。在二桥、南湾发现“帝君百石”印纹砖，也可相互印证，从印纹砖铭文发现，汉徐闻确有秩在百石的朝廷命官，而且东汉初年的徐闻令也确有其人。如1960年合浦黄泥岗1号墓墓主就是徐闻令陈褒。

查辞书，主簿，官名。汉代以来中央机构及地方郡、县官府都设有主簿，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为椽吏之首。州，县主簿皆汉时置。州主簿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县主簿主诸簿目，历朝皆有。

从事，官名，汉制，州刺史之佐吏如别驾、治中、主簿、功曹等，均称为从事吏。又有郡国从事吏，每郡各一人，主管文书，察举非法。

徐闻汉代文物印证了有关史料的记载，佐证了汉徐闻城行政级别，职官的层次，并且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各种状况。建筑、铸冶、陶艺、渔猎、农耕、畜牧、航海、纺织、对外贸易、军事斗争、社会习俗风尚都在汉代文物中得到体现。

#### （一）汉徐闻城城址文物解读

据赵丛苍主编的中国文物序列，戈父编著的《古代瓦当》记载：“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瓦当头。”“前人训当为底，谓瓦栉比置于檐际，瓦瓦相值，而带瓦头的筒瓦正当众瓦之底，带有阻挡遮拦的作用”。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瓦当和瓦，同出于周原西周中晚期的宫殿建筑群遗址。西周瓦当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成熟、发达和独具特色，是我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中又

一独创。瓦当的使用不仅可以起到加固建筑构件、保护屋檐椽头免受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寿命的作用，它更以其图案、文字的美妙、生动，达到装饰和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中国古代瓦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研究价值，其在考古、历史研究、古文字和美术书法艺术以及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有着其他文化类型品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徐闻历史上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汉代瓦当。年代最早的是卷云箭镞纹瓦当（属西汉时期）、万岁瓦当、灵芝纹瓦当与吉羊纹瓦当（均属东汉）。这些瓦当都是在南山镇二桥、南湾、仕尾汉代生活遗址出土。

1990年5月31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恒彬、朱非素、邱立诚、尚杰一行到二桥、南湾考察时在仕尾堤围西段20米处路边的排水沟，徐恒彬先生捡到了一个瓦当头，上面刻有小篆“万岁”两字。瓦当的发现成了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证物。

徐闻的“万岁”瓦当与汉长安城遗址、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出土的“万岁”圆瓦当以及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的大有不同。徐闻“万岁”瓦当偏小，边轮阔，中间圆钮双圈，内有十字界，“万岁”两字呈上下摆放，外左右两格有双山纹（或可考为船帆纹），“万岁”两字的写法不同，笔画粗壮。

1993年11月，广东省考古队在二桥潘家连老师庭院里搞了大型探方发掘，发现了“万岁”瓦当和其他瓦当的碎片，但没有相对完整的。2009年大汉三墩建设时，施工单位发现一件相对完整的“万岁”瓦当头和卷云箭镞纹瓦当，卷云箭镞纹瓦当在广东潮州澄海县雄狮山遗址曾有发现，为此广东省考古所邱立诚先生在专文中定为均属于西汉时期。因此考古专家们对徐闻汉代遗址年代的定位追溯到西汉，后来于2003年11月广东省考古所在二桥村后坡平台开展的探坑和探洞发掘，出土了一批相关文物，如铁犁、瓦当、板瓦、筒瓦、箭镞等等，进一步得到了印证，从而使徐闻西汉遗址的定位证据更加坚挺有力。

吉羊纹瓦当。2009年在仕尾岭发现了相对完整的吉羊纹瓦当，其卷云纹图案相对称为“𦍋”，形状像古代的羊角纹。羊角是否可以理解为古代羊角风，属风纹，典出“如羊角扶摇直上”。“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名为羊角，旋风而屈曲，盘旋象羊的角”。汉高祖刘邦曾写过《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还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么“大风”“飞云”体现刘邦的时代气魄、时代风格，以人的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美。“在秦和汉的云纹变化图案中，常出现‘𦍋’的类似图案，这种图案特点很像古文字中的‘𦍋’（羊）”（杨力民《中国古代瓦当艺术》）。古汉字“羊”通“祥”，汉元嘉刀铭：“宜侯王，大吉羊。”可见羊纹为吉祥文，不但可以“宜官”，更宜“侯王”。



吉羊纹瓦当

还有一种汉瓦当是灵芝纹瓦当。在20世纪90年代末，仕尾村村民在自家院子里挖灰池时发现，同时还发现许多马的骨植和牙齿。灵芝是一种吉祥物，做为瓦当图案的出现，使汉代徐闻的建筑构件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除了文字瓦当，还有植物、动物、风、云等图纹，题材更加广泛。它凝结了汉朝的精神气质和艺术风貌，体现出中华民族装饰艺术的传统美学观和东方审美心理，体现了汉代瓦当的特点：1. 成套瓦当作品的出现；2. 细腻而不烦琐地形象刻画；3. 图案的幻想色彩和浪漫主义色彩；4. 瓦当乳钉的出现（即俗称为瓦当中间的圆饼），在结构上讲究充盈和动感；5. 打破瓦当图案装饰单一的界限，出现了动物、文字、云、几何纹等多种形式结合的组合图案。



灵芝纹瓦当

## （二）汉代印章

印章是汉代权力等级制度的象征。在二桥、南湾村汉港遗址中发掘到一枚印章，质地为铜，印长2.5厘米，宽2厘米，高1.3厘米，印纽为一伏龟，“田”字格印面刻阴文（白文）“臣固私印”四字，龟印表面有锈蚀。据查，龟钮印大约出现在西汉的文景时期，在汉代，龟钮官印是高级官吏佩戴的一种钮式。《汉旧仪》中解释：“龟者，阴物，抱甲负文，随时蛰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引申为能文能武才能够达到做官的标准，这也解释了古代高官为什么喜欢用龟形做印纽的原因。

古印玺研究专家叶其峰先生就这枚龟印的特征及年代做了详细解释。“臣固私印”印面有界格，从汉印发展规律考察，凡是有界格的印章均较早，绝大多数在西汉早期，极个别在西汉武帝时期。此龟印文字刻得很差，但其“印”字末笔明显下垂，这种笔势也较早。此外，龟体较扁，呈伏状，龟首微突，也属早期特征，所以此印的时代定在西汉中期为宜。

关于“臣固私印”中关于“臣”字的含义和龟印主人身份地位的猜想，原广东省博物馆资深研究员杨式挺先生在其文中作了详细的说明：“臣无疑是印主的称谓，在汉印中镌有‘臣’的甚多，可能是朝廷命官对皇帝称臣的，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自称，在印章中镌臣字是自谦，也是对别人的尊重。”至于“固”为何人？持此龟印的主人可能是“郡太守属下，主簿，从事”。据史载《汉旧仪》：“丞相、列侯、将军金印”，“二千石银印”；“（武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以下铜印”。按汉朝制度：郡守、都尉、太守、御史等授银印，相当于享受二千石的俸禄，以下为铜印，这样看来此印主人大概享受二百石至八百石（十斗为一石）俸禄的主簿或从事。查辞书：“主簿、从事均为官名，汉代以来中央机构及地方郡、县官府都设有主簿，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为椽史之首。”

无独有偶，广西合浦县黄泥岗一号墓出土了一枚“徐闻令印”滑石印，瓦钮，高2厘米，边宽2.3厘米，阴文篆体反书，刻工草率。“徐闻令印”，其令为县令，据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徐闻县长官是“令”，知徐闻县已是万户以上的大县，徐闻县令死后葬于合浦，随葬品十分奢侈豪华，包括有金器、玉器和玛瑙水晶制品，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生前管辖的徐闻地区相当富裕，这应同繁荣的海外交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 （三）三墩编钟

中国古代铜制打击乐器，历史悠久。

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陶钟”，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以后的钟，始为铜制。

古代单悬而大的叫特钟，在祭典或古乐演奏时常与“编钟”并列，与“特磬”相对，多置于殿廷之东，象征日出阳刚之气。古时特钟常定音为黄钟。

由许多较小的钟编悬而成的叫作“编钟”。大多数是十六枚分两层编排。如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则多达六十四枚分三层悬挂。它的出现，说明原来是从节奏乐器，发展为旋律乐器。

编钟以其柄的形状区分：长方钮的称钮钟，圆柱柄的称甬钟。

钟形因朝代的不同有方、椭圆之别，钟口亦有凸圆、平口、凹陷之别。

古代宴乐歌唱之前必先奏钟，故编钟又称“歌钟”。

徐闻发现的甬钟是大汉三墩附近渔民在捕鱼作业时从三墩附近海区捞起。捞起时通体均为蚝冰包裹，黄铜质，钟通高 62 厘米，肩有三节圆柄，柄边有系（圆钮），柄径 5 厘米，长 24 厘米。钟体（钲部）上宽 28 厘米，下宽 31 厘米，高 39 厘米。钟体上窄下宽，呈椭圆形，又似榄形。钟口凹陷，钟体边棱（铣）和钲中分四格装饰，格内素面无纹，起阻尼和消音的作用。该钟总重为 16 公斤。



铜编钟

#### （四）徐闻铜鼓

铜鼓是流行于我国西南部的一种青铜乐器，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广西、贵州、广东、四川、湖南等地，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是世界上时代最早的铜鼓。

铜鼓既是乐器，又是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可以作召集人群、传递信息的工具。楚雄万家坝型铜鼓从造型上看，当属最原始的状态。

铜鼓可分为鼓面和鼓身两部分，鼓身自上而下又可分为胴、腰、足三段。胴腰之间的环钮称为鼓耳。鼓面中心的星形称之为芒，四周凸起的圆心圆环绕芒，两圈之间称为一晕，鼓身亦有晕，纹饰分面于晕之间。

徐闻出土的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共两面，一面在南山镇迈熟村（现藏雷州市博物馆），一面在城北乡大黄社朗仔村（现藏徐闻县博物馆）。还有一面属北流型铜鼓（现藏徐闻县博物馆），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曲界镇愚公楼附近深井村出土，鼓面完好，鼓身大残。

楚雄万家坝型铜鼓出现在徐闻两个不同的方位，都是在沿海纵深陆地 3—5 公里的地方，且这里均发现汉墓群或在耕土层出现汉代陶器碎片样本，说明在汉代乃至战国时期，其地曾有先民居住，这些先民的地位非同一般，故形成特殊的群体聚落。愚公楼铜鼓出土点距海岸约 15—20 公里，这里尚未发现其他同时代之参照物，年代似稍为晚，但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延伸的一个重要节点。